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Kaufman

斯迪芬·海哥德、罗伯特·R.考夫曼/著

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



经济危机在政治自由化和
民主化浪潮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新的民主政治能够应对由
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令人生畏的政治挑战么？
民主体制在何种经济和
制度环境中更有可能巩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张大军/译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斯迪芬·海哥德、罗伯特·R.考夫曼/著

民主化转型的
政治经济分析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海哥德, 考夫曼著; 张大军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5097 - 0096 - 9

I. 民… II. ①海… ②考… ③张… III. 政治经济学 -
分析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8274 号

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

著 者 / 斯迪芬·海哥德 罗伯特·R. 考夫曼
译 者 / 张大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65595789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负责 / 王 绯
责任编辑 / 童根兴
责任校对 / 汪建根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22
字 数 / 376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096 - 9/D · 0039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6 - 4159 号
登 记 号 /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确定的历史不确定性

(代译序)

除共产国家与自由世界的冷战与对抗之外，20 世纪后半期世界历史的另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是后发国家对先进国家的追随与模仿。当然，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之外的其他后发国家与地区。它们追随与模仿的既有普世价值方面的自由与人权等观念，也有宪政民主与市场经济等制度方面的社会组织模式，同时更有以信息通讯产业为代表的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成就以及现代化的生产与消费手段。这种追随与模仿的反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市场经济国家所起的激励与示范作用。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一起构成势必将长久影响人类历史的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过程。随着冷战的结束，前中东欧共产党国家通过政治上的民主化与经济上的市场化也迅速加入这一全球化洪流。而像越南等共产党国家也开始实行经济改革，试图部分地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全球化似乎已经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趋势。至少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由于交通通讯技术手段的不断提升，全球化进程在 21 世纪将不断加速。如果世界文明纪元从埃及、苏美尔文明算起，那么这可算得上世界史上六千年未有之变局了。

这波全球化浪潮为何得以以这般势如破竹的态势席卷全球？或者说，后发国家的民众为何对全球化趋之若鹜？笔者以为，先进国家的物质激励与道义示范作用是推动这一波史无前例的全球化进程的原动力。众所周知，仅就最一般的情况而言，个人美好幸福生活的标准就是物质上的富足与人格精神上的自主与尊严。

而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这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比幸福更重要么？如果一个人认同这样的前提，他就不难发现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奥秘所在，因为作为全球化现象之核心的民主市场经济模式恰恰在实现物质福利的最大化与保障个人自治与尊严方面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的模式。一方面，以私有产权与个人自主择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激励了人们工作与创业的激情，为个人与社会财富的最大化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宪政民主体制在保障个人人身自由与财产权利的同时，还在制度上保证公民们的身份平等，这使他们在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中都能保持自主并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另外，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民主体制可以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它可以通过合法的程序让社会财富的分配变得更为均匀，从而使社会普通成员都能分享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好处。中国俗话讲：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起来给大家看。无论一国的统治者在口头上或者意识形态上给老百姓许下怎样的诺言，但坚守“实用理性”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众只相信那些能带来实际成效的东西。于是乎，全球化浪潮就变得势不可挡了。于是乎，我也确信，全球化的趋势具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确定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学者福山于1989年提出“历史终结”一说。当然，关于福山的预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这一论断过于悲观，因为这将彻底消解世界的多样性。也有人以为它过于乐观，因为这几乎等于无视异于西方文明的自主性文明体系的内在价值观对自由民主与市场体制的抗拒与排斥。当然，差别只在于你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无论怎样，人们还是要承认，他道出了一部分的历史真相。世界各地最近发生的事变无疑证实了福山的一些判断，因为后发国家的民主变革汹涌澎湃：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国因外部的军事干预而被动转型，印度尼西亚、格鲁吉亚、乌克兰与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在民众街头抗议的压力下做出顺应民意的变革；而埃及、巴勒斯坦地区以及沙特阿拉伯也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实行政治自由化，有限度地开放政治竞争。同样，在外部世界激烈变迁的推动下，俄罗斯的普京总统也提出要推进本国的民主事业。

尽管如此,笔者并不完全赞成福山的观点,因为笔者认为,虽然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是几乎全世界主流人群的共同目标,但认同这一愿景并不等于这种愿景可以一蹴而就地实现。民主体制的建立与巩固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与积累,意识形态的口号并不能取代扎实的工作。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后发国家的民主化有时要经历一些反复,尤其是像巴基斯坦这样的经济条件差而社会状况复杂的国家在经历了不成熟的民主化实验后,民主体制被迫暂时让位。在将来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专制与民主的斗争与反复将是某些国家的历史宿命。因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对很多后发国家而言,历史并没有终结,它还要呈现出某种“不确定性”。

全球化目标的确定性与全球化具体过程的不确定性构成我们时代的一个重大悖论:确定的历史不确定性。解决这一悖论应该算是对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挑战。只有我们将后一个“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或者概率至少在80%以上的“确定性”时,我们对未来才会有真实的信心,而不是只有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信念或者满腔的热情。从某种意义上讲,解决这一悖论的过程其实就是进行风险管理的过程(因为金融学或经济学意义上的风险也就是不确定性),或者更进一步讲,这需要技术化的处理手段。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的角度有很多,但笔者认为,鉴于刚才提到的全球化浪潮的动力机制,一种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在理论上可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正是出于这一信念,笔者开始着手翻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

该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分析与经济分析结合在一起。它考察了经济环境、经济治理、经济绩效与政体转型、政党结构、制度框架在民主体制建立与巩固过程中的复杂互动关系。可以说,该书基本上都是从政策与制度层面来谈论具体的民主体制的建立与深化的。由于该书研究的大部分案例国家与地区的民主化转型都很成功,这些他山之石对其他尚未实现转型的国家有着很好的参照价值。虽然该书详细谈到十几个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泛泛而论的更多),但它并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分析

模式，同时也没有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而是对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都做出个别的阐述。这一方面可以说明转型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另一方面可能也从侧面论证了我上面提到的过程的“不确定性”。

最后，作为一个中国人，谈全球化就必然会谈到中国。上面提到的民主市场经济模式的突出表征是开放性与竞争性。而中国在自己的王朝循环式的闭合文明系统里惯性发展了几千年，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传统统治模式才开始被动接触外部世界。在经受过血与火的教训之后，“华夷之辨”的固陋与“天朝上国”的褊狭最终被开放竞争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碾得粉碎。其间，机会主义与工具论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也遭到惨败。在经过几代人的痛苦摸索与思考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只有在全面了解和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和“拿来主义”的气魄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才能真正既保障生活于其中的每个公民的自由、尊严与福祉，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崛起的历史性目标。

于是，被中国共产党尊为“先行者”的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世界潮流，顺昌逆亡”的理论；60年前，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提问时说：民主是打破中国兴亡周期律的新路；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在台湾地区推行面向世界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邓小平先生提出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战略，并试图以对外开放推动内部的经济改革；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主执政”的理念。所有这些，都显示中国的政治人物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一种对历史发展“确定性”的体认。

毫无疑问的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中国人将要经受很大的考验，要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可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秉承“生生不息”的顽强求索与创新精神，并凭此开创了一个又一个文明发展的高峰。当代中国人最终要凭借这种精神穿越中国历史的“三峡”。这既是这一代人的挑战，也是他们的责任。他们除了勇敢地迎接这种“确定的历史不确定性”的考验之外，别无他途。

是为序。

目 录

前 言	1
理论方法	3
总的概念和观点	6
威权体制下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稳定	10
新兴民主政权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绩效	12
市场改革和民主体制的巩固	14
经验分析方法：案例选择	16
本书的结构	20

第一部分

威权体制退出的政治经济分析	21
---------------------	----

第一章 威权体制退出的政治经济分析	23
-------------------------	----

经济发展和威权体制的稳定	25
经济危机和威权体制的退出：经验事实规律	31
不同的反应：军人统治的制度基础	36

第二章 经济危机和威权体制的退出	45
------------------------	----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政策动态	46
商业精英的背弃	54
经济危机和大众动员	62

退出权位	68
结论	76
第三章 渡过危机，在经济繁荣时期退出	78
渡过危机继续执政：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	79
危机、崩溃和重新确立军人统治：韩国	87
在经济繁荣时期退出	96
结论 威权统治和社会现实的产物	114
第四章 不同的威权体制退出模式比较	116
军队特权的退出	117
建立政治竞争体系	126
政党的重建	133
结论	161
第二部分	161
新兴民主体制变革的政治经济分析	163
第五章 民主化转型和经济改革	165
确定问题：经济政策和绩效	168
经济改革的政治障碍	170
经济遗产的政治含义	174
政治起点：行政权力和政党体系	178
政党体系的政策影响	185
对危机和非危机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对比	190
结论 经济政策的政治后果	198
第六章 新兴民主体制和经济危机	199
失败的政策：玻利维亚、秘鲁、阿根廷和巴西	200

转折：1980 年代后期的新自由主义方案	217
菲律宾和乌拉圭	232
结论	250

第七章 非危机转型民主体制的经济治理	251
韩国	255
泰国	265
土耳其	275
智利	284
结论 对非危机转型国家改革行动的政治分析	294

第八章 一党主导体制下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墨西哥和中国台湾	296
主导政党型统治的政治经济分析	298
对中国台湾发展历程的政治经济分析	307
墨西哥体制：1980 年代的危机	313
围绕墨西哥经济改革展开的政治活动	
(1982 ~ 1988 年)	319
主导政党体制下的政治改革	324
结论	341

第三部分

民主体制的巩固和经济改革	343
--------------------	-----

第九章 经济改革和民主体制的巩固	345
新自由主义改革、重建政府以及增长的前景	346
收入不平等和贫穷问题	355
经济增长、社会福利以及民主体制的巩固	364

第十章 制度、民主体制的巩固及可持续增长	375
行政机关责任的两难处境	376
功能型代表：社会协定的前景和合作主义	381
立法型代表：总统制与议会制的争论	387
结论	408
总结	
比较不同的民主化转型模式	411
经济危机与威权体制的退出	415
危机与非危机转型以及新兴民主秩序	416
政党、民主以及经济治理	418
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启示	420
民主体制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	426

前言

在过去 20 年中,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划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变化。政治领域中最显著的进展是出现了从威权体制向民主化转型的普遍趋势。由于内部的纷争和外部的政治压力,南欧的独裁政权首先倒台。拉丁美洲的军队从 1970 年代后期开始退出权力体系。在紧接着的 10 年时间内,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开始了政治转型,它们包括:韩国、中国台湾、泰国、菲律宾、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被亨廷顿称为“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在 1980 年代晚期随着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令人吃惊的垮台而达到波峰,并由此增加了对非洲和中东威权政府的压力。^①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也同样剧烈。1980 年代初期的外部冲击对很多国家造成了比大萧条之于当时的西方国家还严重的冲击,并造成这些国家整个 1980 年代的衰退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在有些国家,这些问题一直持续到 1990 年代。为应对这种冲击,这些国家的发展战略实现了深刻的转变:即从国家主导的内向式增长模式转向强调市场、私有制以及对贸易和外国投资更大的开放度。^②虽然每个国家经济自由化的步伐不同,但总的变革方向毫无疑问是一致的。

① 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1)。

② 关于对 1980 年代推行的主要政策改革措施的简要看法,见约翰·威廉姆逊所编之《拉丁美洲的调整措施:发生了多少事?》(华盛顿特区:国际经济研究所,1990);奥里威尔·布兰查德等:《东欧的改革》(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

这些历史性变革的同时出现给我们提出了关于经济改革和政治变革关系的一系列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几近全球性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潮流中,经济危机发挥了什么作用?新兴的民主政体能够应对经济危机和改革事业所带来的巨大政治挑战吗?在什么样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下民主体制最有可能得到巩固?

无论是起源于1950年代的关于现代化的自由主义理论,还是在此之后出现的比较悲观的依附理论,都没有能够对这些问题提出令人完全满意的答案。现代化理论假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化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因此没能预计到席卷已经相对工业化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新威权主义”。^①它也无法解释在东亚地区长期存在的经济上成功的威权型资本主义。如果对民主和威权体制的转型进行更深入的考察,人们也会对马克思主义和依附理论以及“官僚—威权主义”文献所谈论的社会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产生疑问。^②到1980年代初期,大部分对政体转型的分析都不再进行任何经济解释,转而强调纯粹政治过程的自足性。^③

尽管对“政治过程”的关心是对早先思想倾向的一种重要矫正,但将经济分析和政治分析完全分离开来的做法是错误的;经济条件及政策和政治制度的特性一起影响民主化的前景。本书的目的是利用大量有关民主化转型和经济改革的文献提出一种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模式。

① 古勒莫·奥得耐尔:《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加利福尼亚州伯克莱:国际问题研究所,1973);大卫·克里尔编《拉丁美洲的新威权主义》(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

② 在下面的著作中能发现对研究政体转型的社会经济方法的批评:克里尔编《新威权主义》(尤其是大卫·克里尔的《官僚威权主义模式概论》),第3~19页;埃尔伯特·O.赫希曼的《拉丁美洲向威权主义的转变及对经济决定因素的探求》,第61~99页;以及何塞·塞拉的《有关工业化与威权政体关系的三个错误命题》,和胡安·林兹与阿尔弗雷德·斯特班编《民主体制的失败:危机、崩溃以及新的均衡》(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8),第11~13页。

③ 古勒莫·奥得耐尔、菲利普·施米特和劳伦斯威特海德编《威权统治的转型:民主的前景》(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

我们会探讨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和从威权体制向巩固的民主体制转型过程的不同阶段有关。第一个问题是经济环境如何影响统治精英决定其退出的时机和性质（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二个问题是转型后的经济和制度遗产如何在新兴的民主政体下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第二部分第五章到第八章）。最后，我们研究市场导向改革和民主体制能够得到协调和巩固的条件（第三部分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在研究这些具体的问题之前，先简单解释一下我们总的分析方法和指导我们进行分析的理论架构。

理论方法

体制转型和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要受经济环境和现有制度的约束，其最终决定因素是关键参与者——现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派——的战略选择。不过，最近一些关于民主化转型的文献更加强调“选择”，而不是“约束”。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研究者是古勒莫·奥得耐尔和菲利普·施米特，他们在丹克沃特·拉斯托和胡安·林兹以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了研究。^① 这类研究者主要通过政治参与者所采取的政治策略来确认他们的身份，这些策略包括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政权、结成联盟的倾向，以及和反

① 古勒莫·奥得耐尔和菲利普·施米特：《对不稳定民主体制的暂时结论》，第4部分，载于古勒莫·奥得耐尔、菲利普·施米特和劳伦斯威特海德编《威权统治的转型》。还可参看丹克沃特·拉斯托《民主化转型：建立一个动态模式》，《比较政治》1970年第2期，第337~363页；胡安·林兹与阿尔弗雷德·斯特班编《民主体制的失败：危机、崩溃以及新的均衡》（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8）；杰尔瑟普·迪·帕尔玛《建立民主体制：论民主化转型》（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约翰·希格里和里查德·甘瑟尔：《拉美与南欧的精英及民主体制的巩固》（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特里·林恩·卡尔：《拉丁美洲民主化的难题》，载于《比较政治》1990年第23期，第1~21页；特里·林恩·卡尔与菲利普·施米特：《拉美、南欧与东欧转型的范式》，载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1年第43期，第269~284页。

对派进行交易（“强硬派”对“温和派”）的意愿。奥得耐尔和施米特不否认经济因素或更有持续性的政治组织形式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强调“植根于整个环境之中的高度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中，突发事件、信息的不充分、匆忙而大胆的选择、含混的动机和利益、政治身份的可塑性乃至不明确性，以及某些具体个人的能力都经常会决定性地影响到最后的结果”。^①

奥得耐尔和施米特开创的方法纠正了以前体制转型分析中存在的结构性偏差，并将注意力导向有目的的人类行为是如何不断地塑造制度的。正如亚当·普热沃斯基富有洞察力的论文所呈现的那样，在其博弈论式的论证结构中，一种基于选择的方法既获得了优美的表达，同时又显示出逻辑演绎的力量。^②但是这类方法却不能解释决定参与者政治偏好的因素以及这些偏好发生变化的条件，甚至无法确定关键参与者的身份。如果像奥得耐尔和施米特所做的那样^③，在否认更为传统的制度和社会分类的有效性的同时，却没有回答上述问题，这几乎就等于放弃了对该理论进行一般化解释的可能性。人们很难发现相对抽象的战略选择模型和详细的案例分析之间的中间地带。

一些很重要的经验事实上的原因也要求重新评价这些只注重政治因素的方法。某些关于经济因素不具有重要诱发作用的结论，包括奥得耐尔和施米特所做的那些结论，是在1980年代危机的影响被充分评估之前做出的。现在，人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与严重经济危机联在一起的政治冲突直接导致了若干国家在任威权政府的垮台。而且，我们关注的范围也不仅限于体制转型的决定因素，我们也有兴趣研究过去20年中出现的新兴民主政体的治理绩效和发展前景。政策改革和经济增长问题是这些新兴

① 古勒莫·奥得耐尔和菲利普·施米特：《对不稳定民主体制的暂时结论》，第5页。

② 亚当·普热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美的政治与经济改革》（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

③ 古勒莫·奥得耐尔和菲利普·施米特：《对不稳定民主体制的暂时结论》，第4页。

民主政府政治议程上最突出的问题，成功的经济调整将可能影响到这些民主政体能否得到巩固。

在最广泛的理论层面上，我们的分析受三个实际假设的指引，尽管这三个假设在目前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它们在许多最近的有关民主化转型和巩固的研究写作中却被弃而不用。首先，尽管我们不认可社会利益和关系决定了民主化前景这一强有力的说法，我们假定经济和社会结构是理解政治（包括体制转型政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出发点。^①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对发现政治上相关的集团和他们的政策偏好以及理解政治上的联合和冲突是很重要的。

其次，我们假设政治精英动员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或反对其对手的政治力量的机会将取决于经济政策和绩效如何影响不同社会集团的收入水平。总的经济绩效和政策的分配性后果在所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很重要，影响着在位者和反对派的政治机会。经济危机，比如最近几十年曾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危机，不仅影响不同社会参与者对一组特定政策的偏好，而且影响他们对不同的制度安排的偏好以及他们维护或改变这些制度的能力。

最后，我们认为，如果不考虑社会集团活动的制度背景，要从经济分化和经济利益中推导出政治或政策后果是不可能的。本书的一个中心旨意是：如果不研究代表机构和政权体制本身如何

① 关于民主化的政治经济分析方法，见杰弗里·佛里登《债务、发展与民主：现代政治经济形势与拉丁美洲，1960~1985》（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以及迪特里希·茹谢梅尔、埃佛林·胡波尔·斯迪芬斯和约翰·斯迪芬斯《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主》（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迪特里希·茹谢梅尔、埃佛林·胡波尔·斯迪芬斯和约翰·斯迪芬斯在第12~39页全面评价了从现代化的视角研究民主化的文献。我们没有谈到的一个问题是种族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与基于选择的方法非常不同的是，本书恰恰在开始的时候就提出这样的假设：有组织的社会集团是任何关于政体变革与稳定的理论分析的组成部分。例如，见罗纳德·赫肖威茨《民主的南非——分裂社会中的宪政工程》（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

影响政治的结构，对集团利益、经济政策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一般化解释就没有充分的理论基础。^①

总的概念和观点

我们的分析围绕关于经济政策及绩效、政治制度和威权及民主政体稳定性之间关系的几个核心命题。第一个观点是混合经济体中的所有政权都倚赖于政治领袖和关键支持势力之间的或明或暗的交易。经济条件将决定这种交易的稳定性和强度。好的经济条件会增加所获得的支持；相反，则激励私人部门放弃那种交易的过程，增加下层发生政治抗议的可能性，并降低统治精英处理由此而来的分散式冲突的能力。因此，如果无法避免经济危机或不能对其做出快速调整，反对运动不单指向现政府，而且指向基本游戏规则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我们并不是要暗示，在危机和体制转型之间有一种决定性的关系。在“第三波”民主化开始时，在位的威权统治者面临许多要求政治改革的国际和国内压力，这些压力和经济绩效并没有直接关系。相反，民主体制却经常依靠危机期间所积累的合法性和支持，而这些合法性和支持是威权政府所缺乏的。^② 不过，我们认为，无法避免经济危机或不能成功地进行调整提高了威权政体转型的可能性，并降低了威权领袖控制政治变革进程的能力，包括他们退出的条件。与此类似，我们预期，如果民主政府能够成功地管理好遗留的经济问题，民主化获得巩固的前景就会更好。

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政府有效管理经济的能力？我们以为，无论是威权或民主政体，答案都可在政治制度的性质中找到。我们特别关注两个变量：行政权威的构成，以及在相互竞争

① 比如茹谢梅尔、埃佛林·胡波尔·斯迪芬斯和约翰·斯迪芬斯在一本研究阶级力量在民主化过程中作用的主要著作中做总结时强调政党在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主》，第282页。

② 胡安·林兹与阿尔弗雷德·斯特班：《民主化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东欧》（未出版的文稿），第83～84页。